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研究丛书

宗教与冷战初期的 美苏外交研究 (1945—1953)

贾付强 著

ZONGJIAO YU LENGZHAN CHUQI DE
MEISU WAIJIAO YANJIU (1945—195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研究

宗教与冷战初期的 美苏外交研究（1945—1953）

贾付强 著

ZONGJIAO YU LENGZHAN CHUQI DE
MEISU WAIJIAO YANJIU (1945—19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苏外交研究: 1945 ~ 1953 / 贾付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419 - 8

I. ①宗… II. ①贾… III. ①宗教 - 影响 - 美俄关系 - 研究 -
1945 ~ 1953 IV. ①D871. 22②D85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69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丛书由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点建设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本书为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苏外交研究（1945—1953）”〔社科博2013（19）〕的最终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韩 卉 李建军

执行主任：唐昆雄 陈华森

委 员：韩 卉 李建军 唐昆雄

陈华森 朱健华 杨 芳

欧阳恩良 阳黔花 黎 珍

岳 蓉

总 序

“政者，正也。”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进步过程以及所取得的进步成果。高度的政治文明，是有史以来人类共同憧憬的美好梦想。政治文明建设通过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推动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优化、社会共识的凝聚、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力量的整合，为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提供丰沛的能量，为人们的福祉提供坚强的保障。

在人类文明奔涌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深邃的政治智慧和深入的政治实践，为世界政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巨大贡献。历经两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创举，并作为西方国家选修的范本，成就了西方的文官制度。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进程中，探索、确立、完善人民民主的政治进步成果，创造了令世界瞩目、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形态和制度体系。如今，“北京共识”获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言必称孔子”成为西方社会的时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每一个中国政治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为此，贵州师范大学聚集了一批年富力强、志趣高远的政治学人，他们以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为己任，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深入中国现实社会，传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从丰富的多学科视角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丛书》的出版，既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更是引玉之砖，欢迎学界同仁评头品足、指点迷津，共同为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平与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丛书编委会

2015年1月

序

宗教、外交、国际关系目前在国内外均可堪称热门学科，有关论著可说是不胜枚举。但在过去关于宗教与外交、或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论著却屈指可数，宗教与此两大学科之间并无多少交集，形同“两股道上跑的车”。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美国外交史专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利奥·P. 里布福（Leo P. Ribuffo）曾指出，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美国致力于研究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学者不会超过 5 位，而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史学者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像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和马克·诺尔（Mark Noll）这种重要的〔宗教〕学者”。此种“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在国际关系研究上同样存在，据此本人曾戏称被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地缘政治考量所深度渗透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

然而，随着 20 世纪下半期全球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复兴，以及宗教驱动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来临，尤其是彻底打破长期以来隔离宗教与外交以及国际关系关联性的传统研究范式的九·一一恐袭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际学界对宗教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关联性研究，有关论著大量涌现。以宗教与美国外交为例，除了本书在书目中所列举的论著外，尚有该领域长达 832 页的通史性和标志性巨著《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Andrew Preston,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the Faith: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New York: Knopf, 2012, 该书罗辉博士的中译本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反映该领域主要研究成果的文献选编《宗教与美国外交：基本读本》（Dennis R. Hoover and Douglass M. Johnston, eds.,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Essential Readings*,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而国内在相关领域的跟踪介绍和学术研究也取得了较快进展，这些都为国内宗教与外交及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具体到冷战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宗教因素则遭轻视和忽略。实际上，宗教领域在

冷战期间并非“波澜不惊”，而是“暗流汹涌”。上述《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普雷斯頓就在较大的程度上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即“冷战”不同以往战争的“革命性本质”，也就是超级大国之间直接对抗的巨大风险和实际缺席，这便为其他竞争和冲突手段留下了空间，从而也为宗教和文化因素介入美国外交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任何其他非宗教性战争中极少采用的在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对抗在冷战期间反而被激活，从而使冷战带有一定的“宗教冷战”和“文化冷战”的色彩。只不过在带有世俗主义偏见的学术研究界的视野中，此种色彩不那么彰显而已。

“宗教冷战”虽非贾付强博士首先提出，却是本书的主线。冷战期间宗教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或导致美苏博弈和直接对抗、甚至改变国际关系整体格局的主要事件，是1948年美苏承认以色列国，以及围绕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的斗争，其高峰是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法”；而1983年美国天主教会关于核军备问题的题为“和平的挑战”主教牧函，则被认为是宗教团体方面影响美国公共政策和在国际事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界定性文件。贾付强博士并未选择去深耕这些已有较多研究成果的领域，而是把研究的视野转向宗教因素在美苏冷战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并分别通过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心脏地带”、“危险地带”、“边缘地带”，苏联在“西方国家”、“卫星国”、“中东国家”的宗教活动等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个案，以及对美苏在冷战初期总体宗教战略进行比较研究，来演绎“宗教冷战”的主题。这一叙事和研究策略的运用倒也别开生面，并且使本研究超越美国外交史而具有一定的国际关系史气象。

不过研究“宗教冷战”，或“美苏宗教冷战史”，国内学者还要面临着不少研究上的困难以及该议题本身所固有的研究瓶颈。首先是美苏在宗教领域是否开展了全球范围的竞争和冲突。安德鲁·普雷斯頓在讨论包括冷战在内的美国外交史中的宗教因素时用了“宗教征战”（Crusade，亦可译成十字军讨伐、圣战等，不过“圣战”太容易引起当代而非中世纪的联想）一词，但美国在冷战期间宗教征战或宗教讨伐主要针对的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且把无神论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划等号，因此宗教便成了反共意识形态工具和遏制政策的思想基础之一，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所谓公民宗教的拥护者竭力想要在“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性质与美国国民性的宗教基础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打出宗教旗号来进行社会和国际

动员。而苏联政府与苏联东正教会则凭借“第三罗马”等传统宗教符号和所谓“新旧罗马之争”来扩张其政治和宗教势力范围，统一和收编境内外尤其是东欧卫星国内的东正教会或东仪天主教会，并通过东正教会在国际上开展公共外交。但苏联及其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与资本主义阵营展开的“思想战”、“形象战”和“心灵争夺战”的主要武器，恐怕仍是世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恐怕也并非主要透过“宗教棱镜”来看待美国。因此，把冷战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宗教战争之一，即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全球冲突”（本书所引戴安娜·柯比语）失之于夸张，除非像不少西方人士那样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宗教或化约为无神论，以及把无神论视为彻底的反宗教主张。冷战期间东西方的“两军对垒”在宗教领域所运用的主要是“迂回战术”而非“遭遇战”。因此，冷战的宗教面向及宗教因素，或宗教是冷战的一大特点等提法，要比“宗教冷战”来得妥当。

其次是作为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对资料和语言工具的掌握尤为重要。外交史研究重史料挖掘，国际关系研究重范式建构，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国际关系史，在学术诉求上则具有较多的综合性。在史料搜寻上虽不用“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有关历史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却也不可或缺，对现有研究成果等文献资料的要求则更高；在学术探索上虽不特别强调理论创新，但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论证、批评和修正，则是题中之义。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跨国家、跨学科、跨语种、跨档案的学术要求，往往使有经验的学者望而却步。本书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并且在史料搜寻和理论探索上都下了一定的功夫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反映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素养，但相比于成熟的国际关系史论著，则仍有改进之余地。

最后，如何评估宗教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从来就是一个难题，这与宗教的诸多属性有关。如宗教具有“虚实性”，具有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两大层面，在学术研究上也兼具人文和社科两大属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虽极为重要，但与强调实证的社会科学却不太兼容。宗教又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既可以成为“圣战工具”，又可以成为“和平使者”；既可以是对外扩展和征伐的“灵魂之剑”，又可以是倡导和平和反战主义的“信仰之盾”。各种文献资料均表明，在冷战初期，宗教对美国反共政治动员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样强大，如包括几乎所有派别的美

国基督教会、尤其是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以及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强烈反对，致使杜鲁门政府为与梵蒂冈建立反共宗教统一战线而召开世界宗教峰会的计划最终流产。而美国的政教分离传统无疑也是对美国政府实施其宗教遏制政策的巨大牵制。同样，苏联政体的无神论性质和粗犷的国内宗教政策也使其实施宗教战略的能力大打折扣。本书对此均有所论及。宗教还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宗教在国际舞台上兼具“配角”和“主角”的双重身份。“配角”是宗教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无论其作用或功能是正还是负，宗教在各种国际冲突中很少是单独起作用的，它通常所发挥的是推波助澜的“放大器”或“助推器”作用。鉴于宗教的上述属性，除非在某些个案上进行大量文献和口述资料考证，要在宗教与外交和国际关系事件之间建立某种因果链，决非易事。因此，如本书所论证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把宗教视为冷战的“一个因素”，但这一因素究竟起多大，是因素之一、主要因素还是关键因素，大多数有关论著对此均语焉不详，给不出确切答案。这便是宗教与外交和国际关系难点和弱点所在。

本书是贾付强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是国内相当少见的关于宗教与冷战的论著。作为其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本人在此对贾付强博士表示衷心的祝贺。

徐以骅

2015年1月28日于上海西郊寓所

目 录

导 论	(1)
一 选题的缘起	(1)
二 关于本书的文献综述	(8)
三 研究主旨、观点、方法、创新点及资料来源	(16)
 第一章 冷战前美苏两国的“宗教遗产”	(19)
第一节 “天赋使命”：冷战前美国的“宗教遗产”	(19)
一 “山巅之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精神	(20)
二 “天定命运”：美国“大陆扩张”的宗教动力	(22)
三 “基督使者”：美国“海外扩张”的宗教理念	(24)
第二节 “战略资产”抑或“战略负担”？冷战前苏联的 “宗教遗产”	(27)
一 “战略负担”：卫国战争前的俄罗斯东正教会	(28)
二 “战略资产”：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会	(32)
小结	(37)
 第二章 冷战初期美苏外交的宗教战略及行动	(40)
第一节 冷战初期美国外交的宗教战略及行动	(40)
一 国际反共“宗教战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的宗教战略 ..	(41)
二 “重点捕鱼”：美国建立国际反共“宗教战线”的行动 ..	(44)
第二节 冷战初期苏联外交的宗教战略及行动	(49)
一 “第三罗马”：冷战初期苏联外交的宗教战略	(50)
二 反“旧”反“新”：苏联建立“第三罗马”的行动	(52)
小结	(58)
 第三章 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国外交	(61)
第一节 “遏制”敌人：宗教与美国对“心脏地区”国家的 外交	(62)

一	美国对“心脏地区”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策略	(63)
二	东正教与美国对“心脏地区”国家的外交	(66)
第二节	拉拢“盟友”：宗教与美国对“危险地带”意大利的 外交	(69)
一	美国对“危险地带”意大利的外交目标及策略	(70)
二	天主教与美国对“危险地带”意大利的外交	(74)
第三节	争夺“第三者”：宗教与美国对“边缘地带”泰国的 外交	(79)
一	美国对“边缘地带”泰国的外交目标及策略	(80)
二	佛教与美国对“边缘地带”泰国的外交	(83)
小结		(86)
第四章	宗教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外交	(88)
第一节	培植“亲己者”：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外交	(88)
一	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策略	(90)
二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外交	(94)
第二节	巩固盟友：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对“卫星国”的外交	(99)
一	苏联对“卫星国”的外交目标及策略	(100)
二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对“卫星国”的外交	(106)
第三节	争夺“第三者”：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对中东国家的外交	(112)
一	苏联对中东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策略	(112)
二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对中东国家的外交	(117)
小结		(120)
第五章	异曲同工：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苏外交	(124)
第一节	不约而“同”：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苏外交	(125)
一	指导思想之“同”：宗教是一种外交工具	(125)
二	主要目的之“同”：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	(127)
三	服务领域之“同”：舆论宣传领域	(129)

第二节 两者之“异”：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苏外交	(132)
一 地缘宗教战略之“异”：“全球战略”与“地区战略”	(133)
二 宗教策略之“异”：“求同存异”与“求异存同”	(134)
三 政府主导程度之“异”：美“弱”苏“强”	(136)
第三节 “以史为镜”：美苏案例的启示	(139)
一 重叠与交错：一国信仰版图与政治版图的画卷	(139)
二 一国权力之源：教会之间的“依附”关系	(142)
三 宗教：一种重要的外交资源	(144)
四 “宗教外交”：一国增强“软实力”的可行手段	(149)
小结	(152)
 结语 冷战：一场“宗教冷战”？	(154)
一 冷战：一场美苏之间的“宗教对弈”	(155)
二 冷战：教会之间博弈的“新舞台”	(157)
三 宗教：冷战舞台上的“配角”与“主角”	(159)
 参考文献	(162)
 附录一 关于美国信息交流项目中道德与宗教因素的报告	(194)
 附录二 卡尔波夫致苏联人民委员会斯大林同志的报告	(204)
 后 记	(210)

导 论

一 选题的缘起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电视演说中表示:“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以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讲,我认为有必要说出自己对1985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① 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的当晚19时38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降落,宣告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寿终正寝”,也标志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持续40多年的冷战正式结束。虽然冷战已终结20多年,世界也由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演化为当今的“一超多强”格局^②,但研究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仍然是冷战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中,研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各种资源,特别是利用宗教资源开展的外交博弈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研究“宗教与冷战初期^③的美苏外交”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 冷战:一场远未终结的辩论

自冷战伊始,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就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

① “告苏联公民书”(代序),1991年12月25日,载[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关于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多极世界”,一些学者则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超多强”的世界,还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与中国共治的世界。

③ 关于“冷战”的起止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把“杜鲁门主义”视为冷战的“序幕”,也有学者将1946年4月定为“冷战”的起点,而兰德尔·B.伍兹等把“冷战”的起点定为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认为该次会议把欧洲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唐纳德·E.戴维斯等则把“冷战”的起点推前至1917年。对此,笔者赞成兰德尔·B.伍兹等的观点,认为雅尔塔会议实为冷战奠定了基础。参见William H. McNeill,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194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Randall B. Woods & Howard Jones, *Downing of the Cold War*,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H. Jones, *Quest for Security—A Histor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1996; Caroline Kennedy Pipe, *Stalin's Cold War—Soviet Strategies in Europe, 1943 to 1956*,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美]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徐以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出版的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学者们讨论了各种与冷战紧密相关的议题，并由此诞生了冷战史学的几大学派，如传统派（traditionalist school）、修正派（revisionist school）、新修正派（neo-revisionists）以及“新冷战史学”（the new cold war history）。以约翰·斯帕尼尔（John W. Spanier）和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等为代表的传统派认为，战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对外政策目标是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试图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统治全世界，而美国的一系列对外政策是对苏联扩张的反应。因此，苏联是冷战得以发生的罪魁祸首，应为冷战担负首要责任。^①以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和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等为代表的修正派的观点则与以约翰·斯帕尼尔为代表的传统派的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冷战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必然产物，而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种自卫的表现。^②以卡罗琳·肯尼迪派普（Caroline Kennedy-Pipe）等为代表的“新修正派”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对外政策相互作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美苏双方对战后世界局势与对方的战略意图都存在误判。^③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一些国家外交档案，特别是苏联与原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档案的逐渐解密，“新冷战史学”逐

① Thomas A. Bailey, *America Faces Russia: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from Early Times to Our Da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erbert Feis, *From Trust to Terror: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WW Norton, 1970; Hugh Thomas, *Armed Tru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1945—1946*, London: H. Hamilton, 1986; John W.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1992;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46 (October 1967), pp. 22—52.

② William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 World, 1961; David Horowitz, *The Free World Colossus: A Critiqu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 Wang, 1965; Walter Le 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 Foreign Policy, 1938—1970*, London: Penguin, 1971; 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张宏毅、董宝才：《也谈二战后期冷战的责任者问题》，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第23—29页。

③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Caroline Kennedy-Pipe, *Stalin's Cold War: Soviet Strategies in Europe, 1943 to 1956*,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叶江：《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5页；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104—109页；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第35—42页。

渐兴起。学者们在利用多国档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或认为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冷战^①,或持“综合作用论”^②,或倾向于认为美国应对冷战担负首要责任^③,等等。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冷战已结束20多年,但学术界对冷战的讨论依然是“一场远未终结的辩论”^④,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二) 宗教:“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到冷战后的“回归”

1648年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后,战争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和约的“去宗教化”^⑤导致宗教被排除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之外。但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又迅速增长。^⑥世界三大传统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不但在发生大规模“复兴”,而且民间宗教、新兴宗教也发展迅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12月发布的宗教与公共生活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69亿人口中,基督宗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31.5%,达到22亿人;穆斯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2%,超过16亿人;佛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7.1%,也近5亿人。此外,印度教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5.0%,民间宗教信仰者也达世界总人口的5.9%。^⑦英国著名差传统统计学家托德·约翰森(Todd M. Johnson)等发布的2011年全球差传数据还表明,2011年全球信教人口仍在不断增长,而无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数量则呈下降趋势。^⑧肯·达克(Ken R. Dark)也认为,如果目前的大规模全球宗教复兴速度能够持续,那么到2020年,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②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④ 冯绍雷:《一场远未终结的辩论——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国外学术诠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138—155页。

⑤ 钮松:《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体系中的宗教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

⑥ 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44—49页。

⑦ Pew Research Center's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 December 2012, p. 9.

⑧ Todd M. Johnson, et al., *Christianity 2011: Martyrs and the Resurgence of Relig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5, No. 1 (January 2011), p. 29.

世界人口的 54.2% 将是基督徒, 36.76% 的人口将是穆斯林。^① 此外,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还进一步造成和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运动。^② 这些跨国宗教运动对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而冷战后的巴以冲突、科索沃冲突、“9·11”事件等重大国际事件均凸显了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 有学者表示, 宗教已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③。还有学者认为, 在冷战后, “不理解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④。而笔者要指出的是, 早在冷战初期, 宗教就已重返国际舞台, 并成为美苏两国的一种外交工具。现在, 不少学科的学者都承认, “在整个冷战时期, 包括从战后初期欧洲的分裂到四十多年后共产主义在东欧与苏联的崩溃, 宗教都是冷战的一个因素”^⑤。因此, 如若忽视或抛开宗教因素, 将很难全面、有效地理解冷战初期的国际关系。

(三) 宗教“无用论”: 国际关系研究对宗教的忽视

虽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早就提出应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怀特 (Martin Wight) 也指出宗教应成为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 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持续 40 多年的冷战使国际关系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地缘政治 (geopolitics)、均势 (balance of power)、核武器

① Ken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 73.

② 徐以骅:《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 载《世界宗教文化》2010 年第 1 期, 第 61—66 页。

③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 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 (上),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 页。

④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参见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 页。

⑤ Philip E. Muehlenbeck,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A Global Perspectiv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xi.

⑥ Scott M. Thomas, “Faith, History and Martin Wight: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7, No. 4 (October 2001), pp. 905—929.